

周恩来的故事之三

3

面壁十年图破壁

周恩来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故事

荣维木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周恩来的故事》之三

面壁十年图破壁

——周恩来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故事

荣 维 木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年·北京

目 录

出席中共六大	1
为了革命力量的发展	9
特殊的战斗	18
奔赴中央苏区	27
在瑞金的日子	35
保卫中央苏区	43
支持毛泽东	52
万水千山只等闲	61
红旗插到陕北	69

出席中共六大

1927年10月下旬，周恩来到香港后，在九龙油麻地广东道的一个隐蔽处所安顿下来，对外说是一个姓李的商人。最初，他的病情还很严重，在恶性疟疾的折磨下，不断地发高烧，处在昏迷状态。党组织请来医生为周恩来诊治，还派一位受过护士训练的同志来照顾他。半个月后，他的病情开始好转。

刚刚恢复健康，周恩来立即投入新的斗争。他不顾大病初愈后身体的衰弱，从九龙过海到香港岛，参加了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的研究广州起义的会议。

10月18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总结湘、鄂、粤、赣四省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23日，中央写信给南方局和广东省委，通知周恩来到上海参加会议。11月上旬，周恩来从九龙乘船赶赴上海。

11月9日、10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周恩来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当时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要求各地普遍举行城市暴动，使

城市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这种主张，完全否认了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的实际情况，当时，国民党新军阀已经统治了中国，各地革命力量遭到了严重摧残，共产党员由原来的六万人减少到一万多人，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条件，盲目地在城市发动起义，只能给中国革命造成更大的损害。可是，由于党内许多人对中国革命的规律还缺乏正确的认识，仅仅怀着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强烈仇恨渴望复仇，使会议通过了罗米那兹的这些错误主张。在这次会议上，领导南昌起义的周恩来等人，被指责为是执行了“机会主义的旧政策”，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会全体成员，都受到了“警告”处分。但周恩来的才干却得到了公认，这次会议后不久，他被任命为组织局主任，担负起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中国革命走什么样的路？周恩来认真地思索着，由于他历来注重实际，所以很快就感到，军事冒险行动，不仅不能使革命取得成功，而只会给革命带来更大的损失。

为了挽救危险的局面，周恩来在他的工作职权内做了很大的努力。当浙江省委提出暴动计划后，周恩来在给浙江省委的信中说明，暴动计划太不切实，不能批准。他还说：还未发动群众使土地革命深入，便先计算着扑攻省城，这不仅客观事实不能做到，即在主观上勉强去做，也是军事投机行动。他提出，浙江省委的工作重点在于：一方面努力恢复党和工农群众的组织，一方面发展乡村游击战争和城市工人的日常斗争，只有

发动群众斗争，才能发展到暴动的局面。他批评青年团“无动不暴”的冒险主义倾向时指出，进行冒险“试验”，是孤注一掷的错误，有牺牲许多同志的危险。在指导湖北省委工作时，他要求省委“赶快停止无政府党、盲动主义的行动，很艰苦的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工作，在领导工农群众的日常的斗争中，去发动与创造群众的革命大潮。”

怎样保存起义失败后的革命力量，并把那点力量组织起来继续斗争？周恩来也做了许多工作。贺龙在起义失败后也来到了上海。中共中央原来要他去苏联学习军事，但贺龙请求中央批准他回湘西家乡重建武装。共产国际的代表没有同意贺龙的请求。周恩来坚信贺龙不会说空话，努力说服了中央，批准贺龙去湘鄂边发动武装斗争。贺龙临行前，周恩来特意请他吃了一顿饭，鼓励他回家乡后，要依靠和发动群众，重建工农革命军，开展武装斗争，并向他提出了“依山建军，再向平原发展”的方针。分别的时候，周恩来深情地握着战友的双手，一再嘱咐他一定要注意安全，到了湘鄂边，有什么事要及时和中央联系。后来，贺龙果然没有辜负周恩来的厚望，以他的机智勇敢和在家乡的巨大声望，很快打开了局面，建立了红军和根据地，把革命的火种撒在了家乡，开辟了湘鄂西苏区。周恩来与朱德、陈毅在三河坝分手后，十分关心他们率领的这支起义部队。在中央常委会上，周恩来指出，支持他们留湖南开展武装斗争，和毛泽东取得联络，共同造成武装割据的局面，建立

苏维埃政权。

周恩来的这些努力，为大革命失败后重新组织革命力量，在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发展和壮大红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制定新的革命方针。因此，党决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样的会议，需要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和安定的环境。但在国民党统治的白色恐怖下，中国国内缺少这种条件。于是，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

1928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赴莫斯科，筹备和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5月初，周恩来、邓颖超装扮成一对古董商人，从上海登上一艘日本轮船去大连，再经长春、吉林、哈尔滨，由满洲里转赴莫斯科。

在赴莫斯科的途中，发生过一段意外的遭遇，周恩来沉着机智地应付，从容地化险为夷，留下了一个十分有趣的故事。邓颖超回忆说：

当轮船刚停靠大连码头，我们正准备上岸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对我们进行盘问。首先问恩来同志是做什么的？他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实际我们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也没有）。又问你们做生意的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我们说，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他们又问到哪里去？回答，去吉

林。问到东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他们当即让恩来同志跟他们去水上警察厅。在那里，他们又详细询问恩来同志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当问到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回答他姓周，叫曼青。问他是干什么的？答：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他们问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恩来同志说：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姓氏是不一致的，不象外国人舅舅、叔叔都叫uncle，因此，我舅舅姓周，我姓王。对方又说：我看你不是姓王而是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恩来伸出手去说：你看我象当兵的吗？他们仔细端详不象当兵的手，然后开抽屉看卡片，对恩来讲，你就是周恩来。恩来又反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恩来呢？我姓王，叫王某某。他们的一系列的盘问，恩来同志泰然沉着的一一作了回答。他们为什么怀疑是周恩来，可能与在黄埔军校任职有关，有卡片。”

当敌人要周恩来去水上警察厅时，没有叫邓颖超去。邓颖超不放心，表示要一同去。周恩来对邓颖超发怒说：“你不要去，你去干什么？”他要邓颖超先到旅馆住下，阻止她也去冒险。大约两小时后，周恩来回到了邓颖超身边，他表现出安然无事的樣子。进了旅馆房间，周恩来立即低声对邓颖超说：“我们去接头的证件在哪里？要赶快烧掉。”邓颖超马上把证件找出来，到卫生间撕碎了扔进了马桶。接着，他们就有说有笑地去楼下餐厅吃饭去了。

当天下午，周恩来和邓颖超离开了大连，坐火车前往长

春。在火车上，周恩来他们又被敌人跟踪上了。邓颖超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上车后发现同我们坐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国话同我们攀谈，我们也同他聊天。当时，已识破他是跟踪我们的。我们在长春站下车时他拿出名片给恩来，日本人有交换名片的风俗（后来我才知道）。恩来应立即回片。一般人名片都放在西装小口袋里，实际我们没有名片，恩来装着找的样子，‘噢！我的名片没有装在口袋里，还在箱子里呢！很对不起。’（做要去取的手势）对方说不必，不必了。终于对付过去。”

到长春后，为了避开敌人的跟踪，周恩来住进旅馆后立刻刮掉胡子，脱掉西装，穿上了长袍马褂。从长春，他们又乘车去吉林。在旅馆里，周恩来先写了封信给三弟恩寿，然后住到了周恩来的伯父家停留了两天，周恩来和邓颖超先后离开吉林来到哈尔滨。由于他们接头的证件已毁掉了，无法同党组织接上关系，只好在那里等待。几天后，周恩来在火车站等到了李立三，与党取得了联系。这样，他们从哈尔滨乘火车到了满洲里，又从那里进入苏联，继续乘火车赶赴莫斯科。

6月12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市内的一座大楼里，接见了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邓中夏、苏兆征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斯大林谈了两个问题，第一讲到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第二讲到中国革命的形式，是革命的低潮，而不是革命的高潮。周恩来同意斯大林的

说法。

6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所旧式庄园里开幕。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八十四人、候补代表三十四人，代表着中共四万多名党员。周恩来担任主席团成员和大会秘书长。

在六大期间，周恩来的工作异常繁重。作为秘书长，他主持会议的全部日常工作。大会成立了十个委员会，他参加了其中的七个，并担任组织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召集人。他精力充沛，行动敏捷，处事果断，给参加六大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共六大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周恩来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后来的六届一中全会上，他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政治局常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

7月1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上，周恩来发表了讲话。他说：大会为了求得革命真理，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找到了正确的道路，现在有了正确的路线，回国后要使每个同志了解和执行。

中共六大闭幕后，周恩来又在莫斯科逗留了一段时间。他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他还受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托，办理了六大各项未了事宜，并向在苏联学习的中共党员传达

了六大的精神。

1928年10月初，周恩来离开莫斯科回国，在中国革命的征程上，三十岁的周恩来又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涯。

为了革命力量的发展

1928年11月上旬，周恩来又回到了严重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秘密主持中共中央工作。这时，中国革命力量正受到严重的摧残，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杀，党的组织屡被破坏。怎样才能使党的组织在恶劣的环境中继续生存，保留下革命的种子，并使它重新发芽？这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周恩来受命于危难之际，挑起了恢复党的组织、保护和发展革命力量的重担。

为了防止遭到敌人的破坏，上海党组织采取了分散开来的措施。地处上海闹市区的云南路477号“生黎医院”楼上，挂着“福兴字庄”的店铺招牌，老板和老板娘是周恩来安排的熊瑾汀和朱端绶夫妇，他们以湖南土布土纱商人的名义租下房子，这里实际是中共中央的秘密联络机关，政治局经常在这里开会和办公。离这里不远的浙江中路112号二楼，是中央军委的联络地点，周恩来多次在这里会见各省委的领导人。戈登路善庆里的一座小楼和114号1弄的一个地方，是中央领导人

看文件和起草文件的地方。威海路的达生诊所，是由周恩来派贺诚、柯麟以医生的身分开设的，这里也是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周恩来、李立三、邓小平等人曾多次在这里碰头议事。中共中央各机关的工作人员约有二百多人。为了保护组织和同志的安全，周恩来规定，各机关间禁止往来，组织上只保持单线联系。中央机关还设立了直属党支部，书记由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妇女书记的邓颖超兼任。

由于周恩来采取了以上措施，中共中央机关和在上海的所有党组织，渐渐地稳定下来，在周围一片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又能够正常工作了。

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不仅直接领导着上海的中央机关恢复了正常工作，而且还十分关心全国党组织的恢复。当时，由于各地党组织都遭到了敌人的严重破坏，许多党员为躲避敌人的追捕，分散到各处，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周恩来时刻关心着这些同志的安危，为了保存和聚拢这些被打散的革命力量，他花费了很多心血。

那时，中央组织部的秘密机关设在上海静安寺附近。周恩来每天清晨或深夜都要到那里去，阅读各地送来的报告，听取汇报，急切地寻找着地方党组织和党员的消息。组织部机关的工作十分繁重，周恩来经常通宵达旦地批阅文件，处理问题。各地被打散或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大多都到上海找到了党中央。从国外回来的干部，通常也先到上海向中央报到。周

周恩来为革命力量能够逐渐恢复而欣喜，无论工作多忙，都要抽出时间亲自和这些同志谈话，了解他们的实际困难，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在谈话中，周恩来从政治形势、党的任务、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的关系、秘密工作的方式方法，直到具体工作应怎样展开，都谈得十分详细透彻，使同志们感到了温暖，汲取了力量。周恩来还经常叮嘱组织部机关的工作人员：要热情接待从各地来的同志，因为“干部是革命之本。没有革命干部，就没有革命的事业，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关心、爱护、教育干部，就是对革命事业的关心爱护，是取得革命最后胜利的保证”。周恩来对同志的热忱，使得到上海汇报工作的干部纷纷要求见他，而他也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详细地听取他们的汇报，对各地的工作进行具体的指导。因此，在中央领导成员中，周恩来的工作是最忙碌的，同时也是对各地实际情况了解最多、对干部最熟悉的。周恩来这种关心爱护干部，对同志热情如火的作风，深深地博得了同志们的尊敬和爱戴。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白区的活动被迫转入了地下。但很多同志仍怀念过去轰轰烈烈的斗争，而不习惯地下的秘密斗争，这就使党的组织一再遭到敌人的破坏，党员的安全也受到极大威胁。

周恩来对党组织遭到破坏的情况十分忧虑。为了保护革命力量，使多数同志能够适应新的条件下的斗争，周恩来根据一年多来各地的血的教训，提出了开展秘密斗争要“职业化”

和“社会化”的重要原则，并详细地规定了党的机关在白区秘密工作的具体条件：

第一，要深入群众，必须找当地有职业的人开展工作。第二，机关人员要少，也要有社会职业作掩护。第三，开会人数要少，时间要短，会议外要留一部分人。第四，工作要有分工，但每个人都要了解全部情况，有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五，地下交通网要有严密的布置，几个交通线之间互相保密。第六，技术工作人员要减少，接头要保密，减少接头次数。

周恩来还指出，党组织要生存，革命力量要发展，就要分散地深入到群众中去，流落的党员，不到群众中去是无法得到出路的。

后来的实际情况表明，周恩来这些关于白区秘密工作的原则和具体规定，对恢复党的组织，保护党员的安全，开展革命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共六大召开后一年，各地党组织处境虽然仍很困难，但工作却取得了不小的进步，全国党员人数已从四万多人增加到近七万人，到1930年又发展到十万人，超过了大革命高潮时期的党员人数。这时，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和对革命的领导力量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周恩来不仅对白区革命力量的恢复和发展花费了很大心血，还对根据地的开辟和红军的发展壮大，倾注了极大的精力。

当时的红军刚刚创建，力量还很弱小，在国民党军队的围

攻下，处境十分艰难。在海陆丰、海南岛和陕西渭南、华县，红军斗争都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而遭到失败。1928年8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的工农红军第四军，也在湘南受到了严重损失。红军的发展，这时正处在一个异常艰难的时刻，有人产生了疑问：“红旗到底打得多久？”毛泽东回答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周恩来也以实际行动，做出了同样的回答。

红军的生死存亡，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前途。但当时的中央，有些人只热衷于城市工作。幻想通过城市暴动取得全国政权，而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发展红军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却估计不足。周恩来与这些人的看法不同，他认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如果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

六大以后，中央设立军事部，以杨殷为部长，周恩来作为政治局常委分管这项工作，杨殷被捕后，周恩来兼任军事部长。那时，各地苏区红军送来的文件，都是用药水密写的，周恩来要求中央秘书处，凡是苏区红军送来的文件，都要最先显影抄好，立即交给他看。红军还经常派人到中央汇报工作，请求指示，负责接待他们的也是周恩来。因此，周恩来在中央是对红军情况了解最多、与红军联系最密切的人。他对红军后来的发展壮大，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全国红军中，最重要的是毛泽东、朱德、陈毅领导的工农红军第四军。1929年，红四军内部在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

上出现了分歧，毛泽东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周恩来对红四军的情况十分关心，要求派一个人来汇报情况。8月，陈毅代表红四军来到了上海。周恩来听取了陈毅的汇报，并多次和他亲切交谈。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红军是生长于与敌人的肉搏中，红军的精神是和敌人斗争，内部分歧要用政治方向来判别，必须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不能助长极端民主化的错误倾向。根据周恩来的谈话精神，陈毅代中央给红四军写了一封指示信，由周恩来审定后带回了苏区。临别时，周恩来反复嘱咐：要请毛泽东恢复领导职务，这点必须使红四军全体同志了解和接受；要召开党的会议，分清是非，统一思想，维护毛泽东、朱德对红四军的领导。

陈毅回到苏区后不久，红四军在福建古田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红四军肃清了各种错误思想倾向，加强了内部的团结。这就为党在农村环境中建设一支无产阶级的军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周恩来知道这个消息后十分高兴，立即号召各地红军学习红四军的经验。

湘鄂西苏区红军和鄂豫皖苏区红军游击队，与红四军并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主力。周恩来对那里的红军发展也十分关心。他亲自挑选干部送到苏区加强红军的领导力量，向各地红军介绍好的建军经验和作战经验。他还多次接见各地红军将领，询问红军发展情况并给予具体的指导。

1930年1月，郭述申从鄂豫皖苏区来到上海向中央汇报